

第二章 風雨中的兒女情—晚清狹邪小說的興起

晚清狹邪小說是西元十九世紀中期至二十世紀初期形成的小說流派，主要的表現空間以妓院梨園為主，表現對象大多是名士、名妓、優伶、嫖客、鴇母……等，表現形式多為長篇章回體。首先，先從影響狹邪小說興起的原因討論，應與當時晚清的社會歷史環境，以及青樓文化的轉變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第一節 晚清小說的社會歷史環境

自仁宗嘉慶元年（1796）至宣宗道光十九年（1839），這四十四年是大清帝國的轉捩時期，此一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學風、思想因為開始與西方接觸，所以產生了劇烈的變化，鴉片戰爭（1840）後不久魏源提倡的「師夷長技以治夷」之說；林則徐倡譯《西報》以效法西方文明來革新中國本身的不足；甚至到二十世紀初光緒年間，梁啟超提倡欲以小說救中國之說，認為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足以支配人的心理，可以改變一代的社會，「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¹這些新觀念的出現都與晚清社會環境土壤改變有關。只不過晚清的國勢並沒有因為新思潮的產生而振作，反而每下愈況，列強交相侵迫，內亂更是此起彼落，導致清帝國在內憂外患的夾擊之下終於走上覆亡之途。

自清世宗雍正禁教（1805）之後，中國與西方接觸的大門關閉，此時的中國呈現了發展停滯的狀態，但同一時期的西方資本主義卻在殖民掠奪的腥風血雨中迅速發展。英國從十八世紀中葉開始工業革命，至十九世紀初，蒸汽機被廣泛使用到工業生產中，刺激了生產技術機械化的重大變革，也因此使英國成為世界頭號資本主義強國。法國則緊追在後，十九世紀中葉也躍升為世界工業生產的第二大國。為了開拓新市場，西方資產階級加緊擴張侵略，並且把東南亞、中國作為主要侵略和掠奪的目標。

腐敗的晚清王朝閉目塞聽，對於當時的世界形勢，採閉關鎖國政策，幻想用

¹ 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頁 884。

這樣的手段將世界資本主義的洪流阻絕於國門之外以永保清帝國的長治久安，然而，此一政策卻助長了統治者虛驕、守舊、盲目的惡習，嚴重阻礙中國人認識新事物、探索新問題，從而安於現狀、不思進取，因此，當時的中國科學技術和社會發展早已遠遠落於西方之後了。

十九世紀之後，西方資本主義的絕對優勢已然形成，在西方勢力的壓迫下，中國的門戶被迫打開，傳統中國急速解體，近代中國一幕幕的歷史悲劇開始上演。此時，由於人口暴增所引發的內部民亂開始蠢蠢欲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長期安定，人民出生率不斷激增，國民的生產速度追不上全國人口的上升速度，生活日益困苦，再加上貪官汙吏魚肉人民，自然就容易引發民亂。尤其在道光二十八年到道光三十年（1848—1850），以洪秀全為首的拜上帝會，利用廣西連年饑荒人民苦不堪言的時候趁機起義，前後與滿清對抗長達十五年，戰禍遍及十八省，是有清以來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一次內亂。

鴉片戰爭（1840）之後，中國開始陷入百年不平等條約的束縛而無法自拔，朝野上下漸漸發現中國固有的知識技術不足以應變圖存，於是有學習西方的革新運動開始產生，但當時朝野間守舊之聲大於改革之聲，因此在鴉片、英法聯軍戰後的二十年，政治改革方面並無顯著變更。但是，換個角度來看，這樣混亂的時代卻成為促使小說蓬勃發展的溫床。在古代，小說一直是不被重視的小道文學，時至晚清卻慢慢的從邊緣文類向中心位移，並且在小說中更添加了時代使命感、現實譴責以及教化實用性質。

晚清小說創作的波瀾起伏絕非偶然，社會動盪以及各種思潮變化多端，自然小說家在文學創作時也會添加當時的現實土壤，將所見所聞或多或少的反映在作品裡，他們的創作動機不外乎憤政治之壓制不得不作，痛社會之混濁不得不作，哀婚姻之不自由不得不作，阿英《晚清小說史》將晚清小說歸納了幾個特徵：

第一，充分的反映了當時的政治社會情況，廣泛的從各方面刻劃出社會的每一個角度。第二，當時的作家，意識的以小說作為了武器，不斷的對政

府和一切的社會惡現象抨擊。故此類小說，在全數量中，所佔至少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第三，是大家既知清室不可與圖治，提倡維新愛國，因此也有許多人，利用小說的形式，從事新思想新學識的灌輸，作啟蒙運動。把高深的學理，深入淺出，用少許結構以對話敘述方式出之，惟由於技術上的失敗，成功的也寥寥無幾。第四，是兩性私生活描寫的小說，在此時期不為社會所重，甚至出版商人也不肯印行。雜誌《新小說》、《繡像小說》，所刊載之作品，幾無不與社會有關。直至吳趸人創「寫情小說」此類作品始復抬頭，作成了後來鴛鴦蝴蝶派小說的因子。²

除了阿英的說法之外，此時期影響小說繁榮的社會歷史原因還有以下五點：

一、黑暗腐敗的社會現實影響下出現的普遍社會心理

中國近代社會，尤其鴉片戰爭失敗後緊接著英法聯軍、太平天國事件、甲午戰爭、八國聯軍等，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猶如蠶食鯨吞，中國民族危機日趨嚴重，滿清王朝全面暴露了它在政治、軍事、外交、吏治方面的腐敗，因此，揭露與抨擊清王朝的罪惡、改革弊端、富國強民就成為人們普遍的社會心理。正是人們對清王朝的痛恨和思變的社會心理，促使作家以小說為武器來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表達自己的愛國熱情。這種社會心理也引導近代小說家，把自己的審美視角注入於社會現實題材和近代重大的政治歷史事件，把揭露時弊、改良社會、革新政治作為自己的審美意向和創作動機。一些知識份子開始希望透過小說來改革政治、破除迷信、啓迪民智，同時能讓個人對當代社會不滿情緒發洩，也能讓晚清小說充滿時代性與現實性，更能滿足作家憂國憂民的使命感。利用小說反映了當時的官場政治黑暗、政治腐敗、官僚媚外、地方豪紳作惡，甚至表現出中國人對於外國人的畏懼與屈服，所以這時期譴責小說的繁榮和政治小說出現，與當時人民要求譏切時政、自強思變的社會心理有著密切關係，而這種社會心理，也正是當時的中國人民自我覺醒的表現。

² 阿英：《晚清小說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6），頁5、頁6。

如李伯元《官場現形記》正是一部對於晚清官僚體制作全面批判的作品，通過大量社會現象道出官場的醜惡面以及大小官員的昏庸糊塗、徇私舞弊、鑽營諂媚，直接暴露了官僚體制的完全腐敗。

作者對於晚清官場買官鬻爵，夢想升官發財收賄貪汙的醜態加以諷刺。清朝捐官制度始於康熙，但當時只限於捐虛銜，並不能真正做官。道光之後滿清設立許多捐納名目，如籌軍餉、辦賑災，從中央到地方買官鬻爵之風漸漸盛行，金錢主宰了一切，官場變成了商場，作官的條件不是「德」、「才」而是金錢，用金錢的多少來決定官職的高低。而這些行為不僅沒被統治者阻止，反而得到公認或默認，政治的黑暗以及吏治的腐敗讓滿清政府的前途蒙上了一層陰影。

吳趸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是繼《官場現形記》之後，又一部反映晚清社會生活的作品，利用主人公九死一生在書中扮演觀察者、批判者的角色，他所目睹社會上的形形色色正是小說所要反映以及暴露的對象。而小說所謂「怪」現狀，其實不是當時罕見少有的事物，反而是已經大量存在，早為人所司空見慣、習以為常的事物，以及許許多多歷代相傳，被奉為天經地義的觀念、意識、風俗、民情，這些看似正常的事物，在吳趸人筆下被大膽倒置，這些現實存在的大量事物，非得除舊布新才能讓國家走出新的路子。

二、西方文化輸入中國

西方文化的輸入對近代小說繁榮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引入文學新觀念；二是大量翻譯外國小說。在「西學東漸」的滲透下，西方哲學、美學和文學理論的引進，打破了中國輕視小說的傳統文藝觀。傳統觀念裡，孔子視小說為「小道文學」認為小說的本質是無根之談、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而已，而史學家班固則承襲孔子的小說論調，認定小說乃出自於稗官，所以歷來的史家學者往往將小說作品置於史部的雜傳類，或者子部的雜家、小說家。時至晚清，受到西方外來風氣的影響，部分學者開始注意到小說的重要社會作用。學者嚴復注意到東鄰的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呈現出建設性小說蓬勃發展的現象，而小說界的現代

化和日本的現代化也有相輔相成的交互影響。梁啓超對於西方歷史、文化、制度的了解，大多來自於日文的翻譯著作，戊戌政變之後梁啓超流亡日本，有鑑於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來自於小說的實用功能，於是梁啓超開始積極鼓吹小說，認為小說是改革國家的必要工具。光緒二十八年（1902），梁氏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中，肯定小說所具有的教化功能：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³

這不僅從社會功能上闡明了小說的重要性，甚至將小說作為改造社會的工具，這樣的文化啓蒙工作對於社會的進步是有益的。在梁氏此文的影响下，不少維新派知識份子也紛紛發表文章響應，支持小說的文學地位和社會作用，如光緒三十三年（1907）陶祐曾在「遊戲世界」第三期發表的〈論小說之勢力及其影響〉：

咄！二十世紀之中心點，有一大怪物焉：不脛而走，不翼而飛，不叩而鳴；刺人腦球，驚人眼簾，暢人意界，增人智力；忽而莊，忽而諧，忽而歌，忽而哭，忽而激，忽而勸，忽而諷，忽而嘲；鬱鬱蔥蔥，兀兀矻矻，熱度驟躋極點，電光萬丈，魔力千鈞，有無量不可思議之大勢力，於文學界中放一異彩，標一特色，此何物歟？則小說是。自小說之名詞出現，而膨脹東西劇烈之風潮，握攬古今厲害之界線者，唯此小說；影響世界普通之好尚，變遷民族運動之方針者，亦唯此小說。小說小說，誠文學界中之占最上乘者也。其感人易也，其入人也深，其化人也神，其及人也廣。是以列強進化，多賴稗官，大陸競爭，亦由說部。然則小說界之要點與趣意，可略睹一斑矣。西哲有恆言曰：「小說者，實學術進步之導火線也，社會文

³ 梁啓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梁啓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頁 884。

民之發光線也，個人衛生之新空氣也，國家發達之大基礎也。」⁴

梁啟超等人一反以往輕視小說的傳統偏見，高聲疾呼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強調小說在社會生活上能夠發揮無比的力量，具有轉化社會風氣之重要作用。

梁啟超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譯印政治小說序〉說：

在昔歐洲各國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經歷，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於小說。於是彼中輟學之子，鬻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儈，而商氓，而工匠，而車夫馬卒，而婦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書出，而全國之議論為之一變。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⁵

這是小說的長足進步，從殘叢小語到有關世道人心，進而能做為政治及社會改造的武器。

外國小說大量輸入，對我國小說創作的繁榮的確起了很大推動作用。在嚴復、夏曾佑、梁啟超等人的倡導之下，適應時代的需求，翻譯小說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從 1904 年到 1905 年來看，中國出版界印行的翻譯小說不過九十餘種，而小說創作也還未湧起高潮；但是從 1906 年起翻譯小說急遽增加，近百種的新譯外國小說在中國文化市場上出現。翻譯小說中還有不少是十九世紀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的小說，這些作品的揭露資本主義社會殘暴、貪婪與虛偽，具有強烈的批判意識和揭露力量，這些批判現實主義傑作對當時的譴責小說，在思想內容和創作方式上有很大的影響。

外國小說的輸入，給予中國小說創作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不僅擴大了中國小說家的眼界，更激揚了愛國思想和民族情感。多介紹西方小說與國人見面，就好比引導大家打開窗戶廣覽世界，有助於人們新耳目、識大勢、長知識。並且觀覽

⁴ 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陶祐曾：論小說之勢力及其影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 246、頁 247。

⁵ 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梁啟超：譯印政治小說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 37、頁 38。

了別國的社會狀貌，與自己所處的社會現實對比，則能促激興革之心。當時小說家們所以能廣闊的描繪生活，充滿激情地批判現實，這與接受外來影響關係密切。

三、市民階層擴大，讀者閱讀需求量漸漸增加

由於鴉片戰爭強行打開了長期閉關自守的中國社會，原有的自然經濟結構受到破壞，封建經濟型態慢慢地向半封建半殖民的型態轉化，爲了適應這種新的經濟型態，商埠、通商口岸、小市鎮迅速增加，城市人口也擴充很快，城市機能不僅是政治軍事中心，也成了文化中心。

近代城市人口結構因爲工商業的迅速發展而產生變化，新勞動市場的出現，讓一些人口從農村轉而步入城市成爲新的城市居民，城市裡新興的報館、學校以及各種文化設施，爲士子們的謀生創造了新的條件，這和以前只能靠科舉才能做官進入京城相比，確實是一個很大的轉變。而鄉村人口的移入除了使城市人口迅速擴大以外，更重要的是產生了一個龐大的新讀者群，正統的文人一般不屑於閱讀通俗小說，但是在近代思潮影響下，更多的人改變了對小說的舊觀念，也成爲小說的熱心讀者。市民階層的增多，相對的文化需求也會日漸加大，隨著小說讀者的增多，小說的購買量也必然日漸加大，十九世這種閱讀需求的增加也是造成晚清小說繁榮的一個重要原因。

四、新職業小說家出現

晚清時期開始出現一群新的職業小說家，裡頭的組成份子，既有滿懷變革理想的思想家，如梁啓超；也有立志要打破舊中國的革命者，如陳天華；其他更多的是遊蕩在社會各界的文人士子，他們既是小說的讀者，也同樣是小說的作者。由於晚清開始出現稿酬，這是前代所未有，因此小說創作不再是一種純粹的精神活動，它使小說家以此作爲謀生手段成爲可能，也大大提高了作家創作的積極性，這對於漂泊於城市中無以爲生的落魄文人，或是想在小說領域有所發展的人，無疑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古代作家著書大部分爲了抒發個人胸中不平之氣，晚清小說家窮愁著書外還能解決生活問題，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爲？

1905 年之前，雖然還沒有像辛亥革命後出現那麼多的專業作家，但近代一些著名小說家如李寶嘉、吳沃堯、劉鶚、韓邦慶等人，在 1905 年之前都進入了小說界，並成為著名的小說家。他們之中有的人既是報刊的主編、主筆，也是重要的撰稿人。如李寶嘉是《繡像小說》的主編，梁啟超是《新小說》的主編，吳沃堯是《月月小說》的主筆，他們也都為刊物供稿，這種身兼編輯和作者的小說家，對於小說的創作和發表，帶來了許多有利條件，從而也促進了小說創作的繁榮。

五、印刷業、出版業的叢生

古代的小說被視為小道文學且地位不高，傳播方式緩慢無法和現在相比擬，所以當時小說家不多，小說作品也有限。中國的書籍印刷，自隋朝以後流行木刻版，宋朝有畢昇發明的活字版印刷術，但是並沒有普遍流行，活字版印刷術傳到歐洲，歐洲人再加以改良，於嘉慶道光年間傳入中國，快捷的印刷速度和較低的印刷成本，促使報刊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與書籍相比，報刊傳播速度快，所刊載的訊息隨時能刷新，不僅流量大價格也便宜，加上定期發行就會產生一個相對穩定的讀者市場，透過這樣的新聞傳播媒體，小說創作以及小說理論的發表，不但能收到驚人的時效，也能建立起一個良好的溝通管道，不僅如此，因為商業都市裡的廣大市民階層喜歡閱讀小說，有不少報紙往往因附載小說引人興趣而增加了銷路，所以大小報紙競載小說就蔚然成風了，甚至有些報紙以每日贈送小說附頁作為加強號召的手段。報紙眾多、銷路廣闊、閱讀需求增加等原因，就為小說的不脛而走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報紙附印小說，在十九世紀末的天津《國聞報》發端，繼起仿效者甚多，後來的大小報紙也多連載長篇小說，最早刊載小說的文學期刊是 1872 年由上海申報館編輯的《瀛寰瑣記》，稍後是由小說家韓子雲個人創辦的專載小說的雜誌《海上奇書》，刊登了韓子雲自撰的文言短篇小說及吳語長篇小說《海上花列傳》。但《海上奇書》所載的還只屬於舊小說，真正體現「小說界革命」精神的，則是

1902年梁啟超在日本東京創辦的《新小說》雜誌，《新小說》是繼《清議報》、《新民叢報》之後，康、梁維新派在日本創辦的重要雜誌，《新小說》創刊後社會上反響之熱烈也大大出乎梁啟超的意料之外，《新小說》是梁啟超想藉此鼓吹革命的產物，創刊號上刊登的《新中國未來記》、《東歐女豪傑》等作品很能符合當時廣大民眾痛恨腐敗政府、要求鏟除專制統治的強烈的政治感情。之後陸續還有刊登吳趸人《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九命奇冤》、《電術奇譚》等。除了少數專業性學術刊物外，其他刊物也都設有小說欄，其中文藝期刊尤其重視小說，較著名的期刊還有《繡像小說》(1903)、《月月小說》(1906)、《小說林》(1907)、《新小說叢》(1908)……等等。

第二節 狹邪小說興起的文化土壤—青樓文化

青樓一詞，原意是用青漆粉飾之樓。起初所指並非妓院，而是一般比較華麗的屋宇，有時作為豪門權貴的代稱。但由於華麗的屋宇與豔麗奢華的生活有關，宋、元以降，青樓的意思發生了偏指，開始與娼妓發生關聯。唐代以後，偏指之意後來居上，青樓成了煙花之地的專指，與平康、北里、行院、章台等詞相比，



多了一點形象感，也多了一絲風雅氣息。

中國古代的妓女、尤其是清代以前的妓女，在中國古代的文藝發展史上佔有一定地位，從而形成了一種「青樓文化」現象。現代社會

古人總認為音樂歌舞非良家婦女所應為

裡，有成就的女歌唱家、女舞蹈家、女音樂家會得到很高的榮譽，而在中國古代，一些家妓、官妓(也包括極少數市妓)則是所處時代歌舞音樂藝術的代表，對推動中國古代藝術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她們為了符合當時統治階級的享樂需要，往往要受嚴格的藝術訓練，具有良好的文化教養。

一、古代娼妓起源

殷商時代，不僅天子擁有女樂，王公貴族也擁有女樂。商紂好酒淫樂，酒池肉林、婦女優娼、鐘鼓管弦時時在側，殘忍暴虐終至滅亡，《管子·輕重甲》：「夏桀有女樂三萬人，終以女樂亡其國。」西周、東周上至君王、官僚貴族、王侯將相，下至士大夫，或多或少都會在家參養美女或舞女藝人供其享樂，這些女性往往都負有呈身、獻技的雙重使命，史書多稱她們為侍姬、愛妾、聲妓、歌姬、舞姬、美人、女樂、倡伎，這是所謂家妓的起源。然而，我國最早的官營妓院是春秋齊國管仲於西元前七世紀所開設的女閭，由於君主貴族佔有大量女性，導致社會上男女比例失調的狀況，為了穩定社會秩序，並且有助於人口成長，於是勸說齊桓公放出一批宮女嫁給社會上的單身男子，齊桓公令宮中女子未嘗御者出嫁之。另一方面，管仲開設女閭，目的是要藉此課稅充國用，也就是花粉稅、花粉錢等；甚至也能用女閭吸引、拉攏、穩定四方遊士，所謂的遊士是在春秋戰國各國兼併之下，逃亡他國的沒落貴族，這些遊士遠離家園、生活放蕩、喜好美色與美酒，因此女閭成為吸引、拉攏、穩定他們的最好手段。女閭也由於其官辦性質所以世稱官妓。

到了秦漢，宮廷嗜好翫聲色歌舞之風未嘗稍減，漢承秦制設立太樂和樂府兩個音樂機構，並且加以擴展，太樂掌管雅樂，樂府掌管地方世俗音樂，這是女樂的進一步發展。

秦漢時期還有一群被安置在軍營妓院中，為軍士中無妻室者提供侍宿，由於



狎妓之風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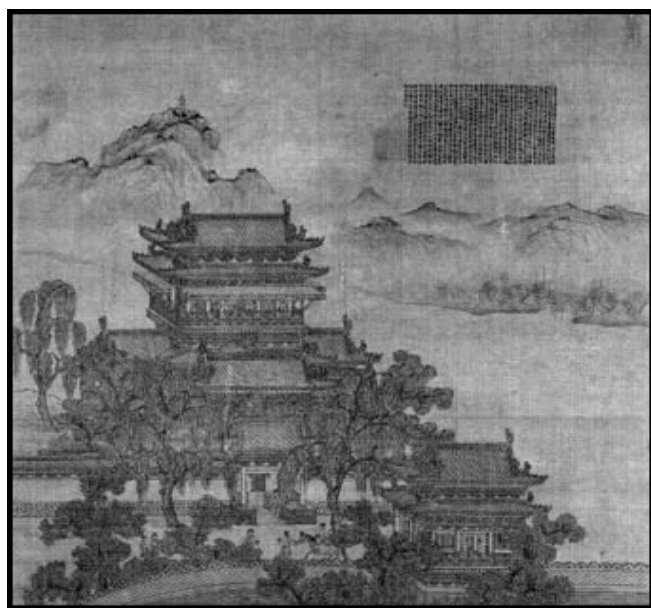
邊境區重兵防守安營紮寨，作戰使命不得攜帶家眷，日久缺乏家庭生活必造成士氣低落，進而影響作戰，於是營妓就應運而生，當時的營妓多由女樂、寡婦、官

奴婢、女俘以及罪犯妻女充當，其中除女樂和少數擅長歌舞伎藝的奴婢能夠提供獻技與呈身的雙重服務外，其他都只能給軍士侍宿。

魏晉南北朝時期，畜養家妓（家中之妓）、女樂已成為世族上層社會的一種風尚，在這些世族眼中蓄養家妓的數量與規模，代表著權勢、地位、錢財的象徵。隋唐開創教坊樂舞制度，所為教坊它的初始意義就是教習樂舞、管理藝人的機構，隋煬帝利用教坊，廣納歌舞藝人，縱情聲色，創作艷詩多篇，令樂官編新聲，教樂人演奏。唐代宮廷音樂沿襲隋朝，唐初武德（西元 618—626）年間，唐高祖李淵開始實行教坊制度，到唐玄宗時，由於他對音樂、歌舞的特殊愛好，在他在位期間宮妓人數大增，教坊最為興盛。教坊妓依色藝高低分等級，平民女子容貌美麗被選入宮廷，除了要學習彈奏琵琶、三弦、箜篌、箏等樂器之外，也要學習歌舞，稱為「奏彈家」；教坊中一般的女藝人屬於宜春院被稱為宮人，因為他們常在皇帝面前表演，所以也被稱為「內人」或「頭前人」。

唐代地方官妓指名隸各地州府、藩鎮的官妓，這些官妓有兩個來源：一是世代屬樂籍的官屬賤民女子，她們沒有別的出路，往往只能做樂妓。二是良家女子，由於各種原因落入樂籍。這些地方官妓屬於地方長官管轄，由長官全權支配，所以常成為地方官的私有財產，他們既可獨佔，又可以隨意贈送。

宋代娼妓制度，因於唐而多有變遷。宋太宗滅北漢後，將攜來的婦女帶進軍隊裡充當營妓，後來又專為那些不帶家眷的州郡官僚設立官妓，南宋杭州瓦舍甚



【元】夏永繪〈豐樂樓圖〉

多，為軍卒暇日提供妓樂。除了營妓之外，當時京師各等酒樓也營妓業，一到傍晚燈火輝煌，數百名妓女濃妝豔抹，聚集在門前四周等著酒徒嫖客招呼，當時著名的「北簪樓」後改為「豐樂樓」，宣和年間又重修了三到五層，層層有飛欄楹，並有明廊暗道相通連，更顯豪華富麗（參照夏永「豐樂樓圖」⁶），當時這種

正店有七十二戶之多，而級別稍低的「腳店」更是不可勝數，風雨寒暑，人來人往，好不興隆。

二、明清娼妓變遷

明初尚存官妓制度，設酒樓以聚四方賓客，但是，明初對於官吏及舍人狎妓有禁令，並且不准買良為娼，然而都市興起，市業繁榮百業興旺，私娼暗妓仍蠢蠢欲動。時至清人入關，除了沿襲明制禁買良為娼外，還在大清律例中嚴格禁止，這些措施和律禁對於抑止娼妓活動，無疑起了重要作用。

大清律例·刑律-犯姦⁷

律

374.00 官吏宿娼

1 凡[文武]官吏宿娼者杖六十[挾妓飲酒亦坐此律]媒合人減一等

⁶ 魏冬：〈夏永及其界畫〉（故宮博物院院刊，1984年4期）。

⁷ 〈大清律例-犯姦〉《國學導航-中國國學經典在線閱讀》，網站：<http://www.guoxue123.com/shibu/0401/01dqll/039.htm>

2 若官員子孫[應襲蔭]宿娼者罪亦如之

375.00 買良為娼

凡娼優樂人買良人子女為娼優及娶為妻妾或乞養為子女者杖一百知情嫁賣者同罪媒合人減一等財禮入官子女歸宗

375.01

凡藉充人牙將領賣婦人逼勒賣姦圖利者枷號三箇月杖一百發雲貴兩廣煙瘴少輕地方如雖無局姦圖騙情事但非係當官交領私具領狀將婦人久養在家逾限不賣希圖重利者杖一百地方官不實力查拿照例議處

375.02

凡無籍之徒及生監衙役兵丁窩頓流娼土妓引誘局騙及得受窩頓娼妓之家財物挺身架護者照窩賭例治罪如係偶然存留為日無幾枷號三箇月杖一百其窩頓月日經久者杖一百徒三年再犯杖一百流三千里得受娼妓家財物者仍准枉法計贓從重論鄰保知情容隱者杖八十受財者亦准枉法論計贓從重科斷其失察之該地方官交部照例議處

375.03

京城內外拿獲窩娼並開設軟棚月日經久之犯除本犯照例治罪外其租給房屋之房主初犯杖八十徒二年再犯杖一百徒三年知情容留之鄰保杖八十房屋入官若甫經窩娼及開設軟棚即被拿獲知情租給之房主杖八十知情容留之鄰保笞四十若房主鄰佑實不知情不坐房至免其入官如業主所置房屋交家人經手有賃給窩娼開設軟棚伊主實不知情者罪坐經手之人儻係官房即將知情租給經手官房之人亦照前例治罪

375.04

凡縱容抑勒妻妾及親女義女子孫之婦妾等項與人通姦者除照縱容抑勒犯姦本律治罪外仍將縱容抑勒之人在本家門首枷號一箇月發落姦夫及婦女俱照律問擬毋庸枷號若有私買良家之女為娼及設計誘買良家之子為優者俱枷號三箇月杖一百徒三年知情賣者與同罪媒合人及串通說合之中保減

一等姦宿者照抑勒妻女與人通姦姦夫杖八十律擬杖八十子女不坐並發歸宗若婦女男子自行起意為娼為優賣姦者照軍民相姦例枷號一箇月杖一百宿娼狎優之人亦照例此例同擬枷杖

大清律例中有明文禁止宿娼、買良為娼等，並且把處罰的方式清楚規定，這讓清朝買娼的風氣暫時減少。

清中葉之後內亂頻仍，對於娼妓問題無暇兼顧，於是妓業呈現興旺之勢，北京、南京、蘇州、揚州、廣東等成為妓業繁盛之地；鴉片戰爭之後，租借地的娼妓業發展更為迅速，上海十里洋場成為嫖妓的名勝之地，妓院集合戲劇、餐館、茶樓、書院為一體，服務功能更加完善，妓館之外的花煙間、台基、野雞、鹹水妹等五花八門競相發展；清末之後，妓院更是和賭博、煙館結合。

三、傳統中國對「妓、妾、妻」的看法

妓、妾、妻是古代社會婦女的幾種角色形象，但是傳統所賦予她們的地位卻極不相同。妓，常與娼、優伶、奴隸、婢女置於同一類，可見得妓是傳統社會中最低下的階層；妾，古代社會法律允許納妾，但視妾為奴婢，在傳統社會中地位略比妓高一些；妻，不管從法律、社會認可的程度都具有最高的名分和地位，妻是明媒正娶進門，所以在宗室中一直有她一個不可缺少的位置。

從古至今，中國以儒家文化為中心，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是建構理想社會的總綱領，所以道德、禮制重於法律，並且強調以禮樂治國，而且儒家先祖把論禮的言論集成了一部《禮記》，在《禮記》裡反覆強調禮的重要作用，認為人都有喜、怒、哀、樂、愛、怒、懼、欲等七情，以飲食男女為大欲，以死亡貧苦為大惡，如果讓人隨意尋其所欲，避其所惡，那麼社會秩序就要混亂，天理常道也會泯滅，所以必須以禮制為準繩、規範。《禮記·禮運》中明確說明了此點：

何謂人情？喜、怒、哀、樂、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

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⁸

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⁹

儒家教導人們需通過自己內心的「明德之性」，於是就能知道何謂恥辱，並且自覺地約束自己的行爲，從而達到社會秩序的和諧。對於人民的外在行爲與內心思維均以禮樂制度加以約束，儒家的三綱五常、四維八德就是禮制的具體表現。除了儒家禮教之外，還有東漢班昭《女誡》、唐朝宋若華《女論語》、王相母親的《女範捷錄》、明代孝文皇后《內訓》等四本被視爲良家婦女必讀之書，內容反覆向女子灌輸三從四德的思想以及封建貞操觀念，所謂古禮「三從四德」根據學者蕭國亮編的《中國娼妓史》中解釋：

「三從」就是指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如此硬是剝奪了女子的獨立自主權，使之依附於男人才能生存。所謂「四德」是指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班昭對此解釋為：「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厲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容也。清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洗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

⁸ 王雲五主編、王夢歐註譯：《禮記今註今譯》（台灣商務印書館發行，1990），頁 362。

⁹ 王雲五主編、王夢歐註譯：《禮記今註今譯》（台灣商務印書館發行，1990），頁 376。

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

10

這些觀念為女子行為制定了很多符合封建禮教的規範和禁忌，為防止男女兩性之欲大洩，於是使用禮教的名義加以完全限制。

就中國傳統儒家禮教而言，夫妻之間的感情，兩性之間的慾望往往避而不談，夫妻之間以禮相待，按禮行事、以禮相隔，因此夫妻像是共同完成任務般，相處變得索然無味。禮教規定婚姻必須服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孟子·滕文公》：「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¹¹所以婚姻中雙方門第、財產、人品才是一樁婚姻的決定因素，至於男女是否兩情相悅，婚姻以後是否能幸福，這些是長輩們不會加以考慮的，所以造成了許多只是屈從於禮教的愚孝，而沒有愛情憧憬的婚姻。

傳統社會來說，妻子對丈夫而言只是陪襯作用，妻子稱為原配、嫡配、正室、正房，過門需要經過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迎親等繁文縟節，納妾不像娶妻那麼正規，妾可以是主人的貼身女奴，也可以是貧窮人家收買來的女子，所以夫家與妾家在正常情況下是不相往來的，妾在名稱上只能稱之為小妻、旁妻、下妻、次妻、庶妻、小婦、偏房、側室、屬婦、逮婦、副室、副房、二房、姨娘、姨太太、小老婆等等，名目繁多，用以表示妻妾之別。妻在家庭中是主子，妾只能算是奴婢，妻所生的子女不以妾為母，但妾所生的子女卻要視正妻為母，並且子女稱之為庶子，庶子不能僭越嫡子繼承宗祧，若妻無子，庶子則上升到嫡子的位置，但家庭主婦仍由妻承擔，妾的地位並不因為兒子的上升而變成正妻，總的說來，妾的地位總是很卑微的，只不過妾比妻容易受寵，妾所生的庶子一旦成為法定繼承人，那麼妾在家庭中的地位則有可能被提升一些，所謂「母以子貴」就是這個道理。但蓄妓則完全出於男子的意願，可以隨心所欲，而且中國古代娼

¹⁰ 蕭國亮編：《中國娼妓史》（天津出版社，1996），頁 230。

¹¹ 清·阮元：〈孟子·滕文公卷第六上·滕文公章句下〉《十三經注疏》（台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7），頁 109。

妓往往兼具才情色藝，這點是為許多妻妾所不及，因此男子與娼妓的交往中更富有詩意情調和浪漫色彩，也能得到精神上的享受，而且妓女在男人面前，不必像妻妾那樣因顧忌自己的角色和倫理常綱而時時克制自己，也不必拘於「相敬如賓」的夫妻約束，妓女只需要極盡可人之能事討狎客歡心，滿足狎客的慾望需求，從而將自己是為性對象提升為情愛對象，或者經由這些感情而改變了妓女的身分。

儘管娼妓在社會生活中為正人君子所不恥，為良家婦女所唾棄，但是縱觀中國歷史，不難發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能看見她們的影子，對於文人墨客們，娼妓更是激發他們藝術靈感的重要泉源。

